

7
讲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拾贰集】

张学良戒烟记

——密勒医生及其在华之贡献

把泰戈尔诗译成古诗

——姚茫大的文艺与述著

先斩后奏的终极武器

——清代的尚方宝剑与王命旗牌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風樓瑣記

【第拾貳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2 - 505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12/高拜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5063 - 3179 - 9

I. 新… II. 高…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0186 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第拾贰集)

作者: (台) 高拜石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陈一铭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2

插页: 3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79 - 9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编·古春风



楼琰记（十二）

目 录

力保光绪帝——经莲珊其人其事	1
为国喉舌——曾劼刚与其《中国先睡后醒论》	8
用财如粪土——广雅书院与广雅书局	23
张学良戒烟记——密勒医生及其在华之贡献	31
少年不识政治味——谈谈陈公博的前半生	45
八百壮士——四行仓库孤军魂	63
诲人不倦——记一个坚苦卓绝的女狱吏	71
光耀乡里——奋斗创业的侨贤张振勋	79
革命的代价——共进会及其三个会长	84
傀儡星照命——溥仪的帝王生涯	109
袁世凯的才子兄弟——项城高士袁孟昂	146
把泰戈尔诗译成古诗——姚茫父的才艺与述著	152
鹤蝶情深——《颉颃楼诗词稿》读后漫记	167
上报的冠军作文——考记室所选之一篇《祭黄花岗文》	206
东北大家长——孝亲爱国硕德崇勋的莫德惠先生	210
火器在中国——由爆竹谈昔时火器	225
话说师爷——由幕宾谈到清代的师爷	233
近代学制的演变——清季变更学制后之学堂	249
书院与学堂——满清一代书院之嬗变	264



火烧天坛——上辛祈谷的北京祈年殿	268
老罗斯福的中国字画——美国白宫所藏的周玉山诗	272
谁是译述界第一人——与林琴南同时的一个译述家	278
王道士贱卖国宝——斯坦因敦煌石室掇宝记	291
跨国人才拼外交——一个替中国工作三十年的英国人	297
五伦只剩半伦——从一副对联谈龚孝珙其人	311
先斩后奏的终极武器——清代的尚方宝剑与王命旗牌	321
做此官，行此礼——清代官场仪制述趣	328
全托太后老姊的福——慈禧后及其弟弟亲家桂公爷	333
诗坛经纪——诗界功臣曹经沅	345
得天居士多子王——黄浦滩的传奇性人物王晓籁	360
军机泄密推拖拉——沈葆楨与台湾番社案	367

力保光绪帝

——经莲珊其人其事

半粟编著《中国六十年大事记》：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九年）十二月，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自去岁八月后，盛传废立之说，人心汹汹，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西太后，请保护圣躬，虽奉旨名捕元善，而非常之谋稍寢。

这就是晚清“己亥建储”的一幕，恽毓鼎之《崇陵传信录》及近代诸家笔记也均有述及，却语焉不详。实则经元善之电并无“请保护圣躬”或“请收回建储成命”，且经元善既不是所谓沪商，也不是保皇党或东南志士，他也更不曾用候选知府名义来领衔，他是用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与马裕藻、叶瀚、章炳麟、蔡元培、吴朏、唐才常、丁惠康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打电报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发电的日子为己亥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电文如下：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



各国有关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一位电报局总办竟敢作此捋虎须的行动，明知道这慈禧皇太后绝不会让光绪帝力疾临御，也绝不会饶恕这种妄干朝政的举动，而偏偏要打这样的一封电报去试试，其勇气是颇堪赞佩的。

这经元善又是什么样的来历呢？宜为一述。

经元善，字莲珊，浙江上虞县经家村人。“经”姓很罕见，《姓氏考略》说此姓望出平阳刘向《说苑》谓魏有经侯，经氏当为其后。此姓名人晋代有经旷，明代有经济、经承辅，自经元善作此惊人之举后，史册上又多了一个姓经的。

经家村人多务农耕，元善的父亲名芳洲，早年便旅居上海，经营商业，好施乐善，曾在上海县城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诸善举，人称“经善人”。

清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间，太平军二次攻打上海城，不及逃避的民间妇女多投清节堂，忠王李秀成也闻芳洲之名，严令不许进扰。其后太平军进入浙江，经过上虞经家村，说是经善人乡里，也相戒不许惊扰。事见上海及上虞两县志。

元善自幼好学，好善亦如其父，读书之暇并留心时事，著有《趋庭纪述》。他父亲死后，遗产约值五六万元，光绪八、九年（公元一八八二、一八八三年）值山西迭遭水旱，灾情惨重，元善即结束店业，带了五万多元从上海乘船北上赴津，亲至灾区散发赈款，全活灾民甚多。自后每遇各省灾害，他便邀同绅富尽力筹赈，并发起协赈公所，募款达数百万，以充救济。地方官把他的善行层报到北京，奉旨嘉奖达十一次之多，叙至知府，归在江苏候补。

中国电信之开创始于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李鸿章于大沽海口炮台架设电线达天津，是为中国自设陆线之始。后以筹办海防，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期无误事机，飭由鸿章派郑藻如、盛宣怀、刘含芳等与丹麦大北公司订立合同，由大北公司代为购料并查勘设线。

此一工程光绪七年五月开始兴工，共用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两。次年三月改归官督商办，由商人按期缴还官本。盛宣怀南下筹划，欲使此线自江苏、浙江、福建以达广东，与两广方面粤商兴造之陆线相接，计程为六千里，工本计银四十馀万两。盛宣怀在沪与经元善洽商，元善即邀同苏人谢家福、郑观应、王荣和等凑集三十五万两投入，着手兴工，即以元善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甲申（光绪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以后，外侮纷乘，而朝廷墨守旧规，毫不知振作。元善平日留心中外政治，忧国之心倍挚，和朋友谈起国事，辄多叹喟。赵竹君（凤昌）于光绪十五年自广东调往武昌，经过上海，由友人介绍，与元善见面，谈起来十分投机，成了密友后，后曾邀约元善到鄂筹办织布局。

甲午年（光绪二十年）中日战起，自北洋水师大东沟战败至马关议约，一般忧国之士均痛心国耻。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诸人都在上海，赵竹君这时也从武昌回来，和元善等会同康、梁讨论。康、梁主张首从上层政治著手，废除八股，实行立宪，开制度局，分办新政；竹君和元善则主张多办学校，开通民智。元善尤主张先办女学堂，因于康、梁等北上之后，即和赵竹君、何眉孙（嗣焜）等联名呈请总理事务衙门，准在上海开办招生，元善且力佐何眉孙等建南洋公学于上海之清华镇。沪上兴学，元善实具首功。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由于康有为诸人的冲动与光绪帝的决心，终于在极勉强的情势之下见诸实行了，君臣们天真地以为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旨一扫而光，便可立即从这古老腐败的帝国中催生出崭新富强的君主立宪



国家，却不料怙权（hù quán，专权）专断的皇太后和顽固大臣们的反动布置得更周密。

八月初六日突然起了大风暴，慈禧由颐和园返宫，见到光绪帝劈面就啐他一脸吐沫，恨恨地数说了一通，随将光绪帝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又用光绪的名义颁下诏书，说是皇帝自己病了，特请皇太后垂帘训政，已蒙皇太后允准。于是维新远景烟消火灭，旧派又抬头了。所谓维新分子杀的杀，罢免的罢免，康有为侥幸先期出京，到上海时得到英国领事的帮助，搭上外国船逃往香港；梁启超也靠日人之助逃往东京，康、梁遂在海外合唱起保皇高调。

慈禧欲废光绪帝，而慑于中外舆情，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先将溥儀选为皇储，作为废立计划的第一步。皇储虽然定了，夺取皇位到底还得等机会，慈禧及她的近臣们只算遂了一半心。慈禧对外人的干涉不免愠怒在心，及接到经元善等一千多人的电报，见中间有“探闻各国出有出兵干预之说”的话，更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外国干预，可能还要出兵，恨的是经元善以卑官末秩竟敢领衔发电，他的后面分明是外国庇护下的康、梁在作祟。

原来，戊戌政变时，各省人士以光绪有志振作而被幽废，甚为不惬（qiè，满意），及废立消息传到上海，一般人更感不平。经元善当时曾密电盛杏蓀（宣怀），请上言挽回，旋得盛氏复电，仅一句话：

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元善得电惶然，认为皇位已危，及闻建储之诏，更证实了慈禧立溥儀为同治嗣子以后，继之而来的一定是再用光绪的名义下诏退位，这是废立二重奏。慈禧一向以祖制来约束人，自己却先犯了祖制，怎能使中外翕服？而那时唐才常和章炳麟等确同康党，志切保皇，又怎能不反对？他们揣知慈禧最顾忌的是外人，尤怕他国出兵

干预，所以在电中加上这么一句，用以吓阻慈禧进一步的行动。

经元善的电报到达北京，太仓唐蔚芝（文治）那时正任总理衙门章京，恰值电报班，一见大惊，把电文呈给军机大臣王文韶阅看时，请这位王大军机伺机化解，免兴大狱。

王嘿然不语，说话间荣禄也到了，把电文看了一遍，怒声说：“这经元善是何等人，胆敢妄言干政。一定要把为首的杀几个，看他们怕不怕！”

这王文韶耳朵本不大方便，却不是全聋，见荣禄大肆咆哮，便假装听不见，嘎嘎了几声，又“啊”了一声：“经元善吗？这名字我熟得很，他是大小儿的好朋友呀！”

荣禄说：“老中堂快别提啦！经元善这小子现在成了反叛了。”

文韶把眼睛一瞪，说：“反叛？经元善这人敢反叛？”

荣禄说：“电报在此，这不分明是要造反？”

文韶又装着糊涂说：“电报？那经元善不是在办电报局吗？许是别人冒他的名，想免付电报费吧！”

荣禄见此老缠夹不清，便道：“这是何等事，哪能以儿戏视之？一定要办，要严办！”

这时，其他军机及章京等人见二人大声在说话，也附和着说：“要严办！”

文韶又作不解状，朝着诸人痴笑。

及召见时，荣禄在文韶耳边大声道：“经元善案一定要杀几个，以昭炯戒。一会儿叫起的时候，老中堂奏对，要同一主张才好。”

文韶把双眉一皱，说：“立大阿哥是天大的喜事啊！杀人不怕忌讳？老佛爷原喜欢吉祥的，怕是不便吧！”

荣禄改容说：“那怎么好？”

文韶说：“叫人把他抓了，关起来不就得了？”

奏对时慈禧果有怒色，文韶即奏：“经元善无知妄言，惟此风不可长，请严旨饬地方官拘捕监禁，以为儆戒。”



慈禧颌之，文韶出，即拟旨电发。

经元善风闻京中要查办的消息，急邀赵竹君诸人到电报局商量。竹君说：“立储本违祖制，内外大员竟无一人敢言，而有待于疏远闲员、在野人士联名电请，莲珊兄可谓朝阳鸣凤，足传千古了。不过事隔许多天都没有明旨，一定又在那里搞花样，不如避一避，免遭不测。”

郑陶斋在座，极以赵言为然，力劝经元善到澳门避避风头，经乃于当晚乘葡轮赴澳门。

元善走了之后，何眉孙旋得盛杏荪北京来电，略谓：经莲珊事，言官有指系赵凤昌袒护，将予一并弹劾，请转询竹君电复云云。

何眉孙把电文给竹君看，竹君呵呵笑道：“我自湖北归来，早已无官一身轻了，言官参我什么，劾我什么？这分明是盛杏荪怕莲珊跑了，希望我不再帮莲珊罢了，不管他！”

遂不复电。复得京中友人告知，都下喧传经元善事的时候，御史余诚格即参盛杏荪，指经元善是盛用的人，应勒令盛交出，以凭讯办。

盛听到消息，急了，一面电何眉孙，向竹君示意恫吓，一面上奏说：经元善系臣奉旨办理电政所用之人，康有为乃余诚格之门生，余为本身洗刷起见，故遽以诬攀。其奏与余针锋相对，枢廷诸臣至此乃知余、康关系，即将余诚格外放广西简缺知府，即日出京。

赵竹君因叹盛杏荪巧于为官，立储前所复致莲珊之电仅出一语，空洞惊人，惹起这一场公案。平心而论，杏荪于紧要关头措词实欠斟酌。

刘坤一奉召入京陛见时，两江总督由鹿传霖（滋轩）署理。一天道员洪某衔命到上海，先访问眉孙，嘱约赵竹君晤谈。竹君如期往晤，一见之下，乃是洪琴西之子。琴西自“三牌楼命案”失察罢官后，调粤差遣，病死于善后局，竹君曾代为料理身后。这洪

道员忆起往事，口呼世叔连连称谢，嗣述鹿传霖之意，希望竹君劝经元善回来，说明仅是永远监禁，绝不致危及生命。竹君即言：“我与滋卿本属交好，按理应当效劳，可是在南京的褚伯约山长及属吏法公堂的葛范夫都是经的亲家，此事何不径托他们？再说此时人未到案，有何定讞？亦岂有劝一亲友就狱以候不测之诛的道理？一旦严旨飭办，滋卿又何能为力？将来史笔大书“署两江总督鹿传霖杀经元善”，似也不值得呀！如指经为康党，莲珊著有《趋庭纪述》刻本，中载有答康之信，责备甚周，足证不是康党。书在此，可带回南京，请滋卿再思之。”

洪去后，消息寂然。但北京抓经不到，即命将其家抄没。竹君恐莲珊在澳门，清廷或会叫李鸿章去引渡，又写信托李幕之徐次舟（麇陞）劝李勿听顺中旨。徐向鸿章提及，鸿章说：“我才不做刀斧手呢！”

此事遂成定案，经安居澳门炮台，受葡人保护。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乱后，端、刚获罪，溥儒被逐出宫。经元善由革命党杨缵泰保出，归沪后不久即卒。



为国喉舌

——曾劼刚与其《中国先睡后醒论》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闰二月二十三日（公元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二日），湘乡曾纪泽以感染伤寒促动旧疾，两症并发，死于北京台基厂私邸，年五十一岁。其时他的职衔是户部右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等侯。清廷诏赠太子少保，照侍郎例给恤，加恩予谥“惠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

翁同龢在这天的日记里记云：

访劼刚问疾，则鼓在门矣。入哭，为改遗折。嗟嗟！
此人通敏，亦尝宣劳，而止于此，可伤也！

曾纪泽，字劼刚，曾国藩长子，袭一等毅勇侯爵，故当时多称他为劼侯或袭侯。李鸿章挽以一联：

执别一旬，何意竟成千载隔；
抗稜（kàng léng，扬威）四裔（旧指四方边远地区，此借指西方国家），此才方识九州难。

另以专折奏陈曾氏在外交上的各项成就，并盛称他的学行。李鸿章

说曾：

少承家训，劭志（qú zhì，苦心）励学，群经俱有论述，于小学乐律尤为颀（专）家，其余力兼通泰西文字语言，更属当代士大夫所罕有。

劭刚的体力原不甚健壮，使欧时便已多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年年）四月交卸使英事务返国，复入总署及海军衙门办事，经常力疾赴公，不肯请假休养。闰二月十六日（阳历四月五日）他还赴户部收放银两，午饭后头痛不止，遂病，前后八日，终以不起，故李鸿章挽句中有“执别一旬”之语。李于专折中更言称：

犹忆闰二月十二日，臣在都会议朝鲜事宜，该侍郎力疾趋公，犹复长虑却顾，情溢于言，何意淹旬（满旬，十天）竟闻永逝。叹其忠爱之忧临危不改，实为国之荅臣（jìn chén，忠诚之臣），而无愧曾国藩之肖子……

俞曲园所作《曾惠敏公墓志铭》亦谓：

醇贤亲王亲临哭奠，谓年甫及艾（五十岁），何遽至此，有其才而不竟其用，惜哉！昔日之间，电传中外，无不同声太息，为朝廷惜此柱石之臣。呜呼！如我公者真我国家之荅臣，而我师文正公之肖子矣。

可见劭刚之突然逝世，不论公私，无不深致悼惜。

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戊寅之秋，曾劭刚奉诏以一等毅勇侯、候补京堂的崇衔继郭嵩焘充出使英法钦差大臣，冬初搭法国商轮从上海启程赴欧。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一月先抵巴黎



觐见法总统麦马洪，呈递到任国书；次即赴英觐见英女皇维多利亚，呈递到任国书后驻于伦敦。庚辰年（光绪六年）春，清廷以崇厚在俄办理伊犁事件不善，革职拿问，诏命曾劼刚兼为出使俄国大臣，当年夏由英赴巴黎转往俄都圣彼得堡，在俄交涉八个多月，始返巴黎再转伦敦。劼刚使处期间，坛坫（tán diàn，会盟的坛台，此借指谈判场所）周旋，折冲樽俎（zhé chōng zūn zǔ，原指在酒席间不用武力而用智谋战胜对手，此指在谈判中显示才华），尤其是办理中俄伊犁交涉，费唇舌者半载有馀，“反复辩论至数千万言”，“衅将开而复弭（mǐ，止息、平息）”，最为朝野所称许。他在外九年，劳瘁备至，至光绪丙戌（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始归，四十开外的人已须发皆白了。

中国遣派使节驻在欧、美、日本等重要国家，始自光绪初年，第一任驻英、法使节为郭嵩焘，继之者即曾纪泽。嵩焘以通晓洋务自负，一心要将国外知识介绍进来，以改变国人一向以天朝人物自诩的浮夸观念，不幸却得不到当时人的根本了解，且遭到重谤。纪泽以名父之子而为世所重，又幸赖有这位世交前辈先负其谤，更因他为当时出使大员中第一个懂得外国语文的人，故能不辱使命，保全令名而归，一时有“閤中博外，体用兼赅（gāi，完备）”的美称。

左宗棠和郭嵩焘不洽，对曾则极度称道，尝谓曾：

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义，志殷补衮（补救规谏君主的阙失）。

曾在外交方面颇有成就，伊犁交涉取得成功、提出对法备战谋和主张及与英协议洋药税厘并征等皆其显例，美史家摩斯（Hosea B. Morse）曾赞他：

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先例。

相形之下，曾纪泽比郭嵩焘要幸运多了，当然事实上他也确是比郭做了更多的工作。

纪泽之绩略行事具于日记《金韬筹笔》与后人所辑之《曾惠敏公集》中，此外他尚有《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发表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二年冬）一月号伦敦之《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中外传诵，当时上海同文馆之颜咏经与袁竹一曾将之译成中文，而曾的文集中没有收入。揆其作文动机，应是纪泽在驻欧八年间，耳目所接，深知西方各国朝野对于中国政教的误解和多方觊觎中国属土的野心，断非中国那套庞然大物、水来土挡的洋务方针所能消解，他审度当前内外情势，特就中国的现状与将来向欧洲人士作一表白，一方面希望西方各国历来对中国加以蔑视和一贯蛮横的态度能有所改变，一方面更希望由此发动外国的舆论，对中国的处境表示同情。

文中，他严斥西人认定中国这东方大国已经由衰老而趋于死亡的谬见，并辩释中国只是暂时陷于酣睡状态，绝非精力耗散，完全不堪救药。总而言之，《中国先睡后醒论》实是一篇为国宣传之作，它同时也宣示了当时中国的外交方针，曾在文中有云：

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中年、老年、一息待尽之年，国亦有之。欧洲之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盖彼见中国古所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达者今多湮塞，昔所传金石土木之工坚致巨丽，今只存遗迹，剥落损坏，无复完美，且做法多有失传者。中国古昔之盛与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国精力业已销铄（xiāo shuò，削弱）殆尽，将近末造（末世），难与他国争胜之势。

又云：



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有英国著名之使臣,深知中国之时事及古今之典籍一时未能或之先者,其言以为:“中国虽疆域广阔,外无异国蚕食,内无土寇鸱张(chī zhāng,如同鸱鸟张翼一样,喻指嚣张凶暴),然其中实有溃散决裂之象,不过略迟而已。余或不应出此言,不妨姑存其说。”其意见如是,而彼时意见相同者不乏其人。大抵欧洲皆以道光末年为中国危险之时,苟易新君新政,略有阙失,即恐灾害并至。纵使幸而无事,终多变故之逃生。然使国家兴必有废,果系天运之循环,一成而不可挽,余只好为积衰之诸国怅然长叹无复望耳。所幸者,此并非一成之局,其言谬也。或谓中国有似年老者,奄奄待尽,则观近时大势,其谬益见。有谓中国仅错走其路,抑或其数百年所走之路习惯而素所深喜者竟误认为固可引至于诸大国所造之胜境,致有此凋敝之形,盖其因由虽在此在彼攸异,而流弊则一。此说亦非。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事实上,中国自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庚申)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对圆明园加以焚掠后,全国上下受到沉重的打击,不能说没有从酣睡中觉醒的情态,因有所谓的“西法模仿”时期。自后比较明敏的政治家如胡、曾、左、沈、李诸名臣逐步仿效西法,以整军经武,洋务遂成为此一时期的政治中心问题,这可为中国逐渐觉醒的明显例证。故曾氏言:

自庚申一炬,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周大作,仅中间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假若做事颠倒,妄行妄为,要为常事,即使异常泼悍,亦不足怪。岂知深悟前失,改弦易辙,贤明亲藩上章入告永以为好为上策,中国先既失算,